

98903



范 缜

——南北朝反对佛教斗争中长大的唯物论者

李曰華 著

229
2

湖北人民出版社

185229

442

K.1

98903

范 縝

——南北朝反對佛教鬥爭中長大的唯物論者

李 日 華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6年·武漢

范 縝
——南北朝反對佛教鬥爭中長大的唯物論者
李 日 華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武漢解放大道332號）

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1號

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

新新印刷廠印刷

787×1092 1/32 開•3 5/16 印張•62,000字

1956年11月第1版

195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00

統一書號：11106·12

內 容 提 要

范縝是我國五世紀下半叶至六世紀初偉大的神滅論者。當東晉、南朝的封建統治階級傾其全力鼓吹其六道輪迴、上有極樂、下有地獄、極端荒唐的迷信，以麻醉苦難的人民時，范縝勇敢地站在維護農民階級利益和中小地主階層利益的立場，來反對神不滅論的謬說和封建門第制度。他的神滅論思想是我國唯物論思想發展史上一座巨大的里程碑。本書概括地介紹了范縝的生平及其思想，並給以適當的評價。可供一般讀者學習歷史和哲學時的參考。

目 錄

時代·····	1
家世、生平、著述·····	14
兩次大論戰經過情形·····	24
神滅論思想·····	34
一、質用范疇的提出與運用·····	35
1. 質用范疇的提出·····	35
2. 事物的變化與發展·····	41
3. 感覺、思維與生理機構·····	48
二、政治思想·····	53
三、宗教思想·····	60
氣、形、神等問題·····	69
神滅論評價·····	81
附錄：范縝遺文·····	89
后記·····	101

时 代

范縝的神滅論^①是唯物論，是中國思想史上唯物論對唯心論不斷鬥爭過程中一個巨大的里程碑。

中國唯物論的發展，由來已久，然在漢代即已由劉安、桓譚、王充等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到了東晉則有“正誣論”作者眼中的“凡俗人”（“弘明”一）慧遠口中的“問者”（“弘明”五）和孫盛（“弘明”五），劉宋則有鄭鮮之眼中的“客”（“弘明”五）和何承天（“弘明”三、四）^②。他們都在對佛教唯心論展開鬥爭中把唯物論向前推進了几步。最後到齊梁間，又在反對佛教鬥爭中，再接再厲向前推進到了更高的階段，而巨大的成就實即范縝的神滅論，中國唯物論發展史上甚或世界唯物論發展史上不可磨滅的光輝的神滅論。

“凡俗人”、“問者”、孫盛、“客”、何承天、特別像范縝，都是佛教的勁敵。他們都是反映當時中小地主以及農民的利益的思想家。他們都富有鬥爭性，從而進步性都很大。

他們出現的時期，正是在民族災難中，廣大的農民群眾

① 本文引語或引用故事，其無注明出處者，大概都出自“梁書”或“南史”內的“范縝傳”，或“弘明集”內的“神滅論”或“答曹思文難神滅論”。

② “弘明”，即“弘明集”；“廣弘”，即“廣弘明集”。

和手工業者，一批批逃難南下，帶來了較為進步的生產技術，向荒地多、土質肥、礦產亦不少的南方進行其大規模的開發（“世說新語”“政事篇”注引“晉陽秋”；“宋書”——“志序”；“晉書”七五“范寧傳”；“宋書”——“武帝紀”；“南齊書”四七“王融傳”），對整個南方社會經濟向前發展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條件，因而整個南方社會經濟面貌也就大大地改變了起來，活躍了起來。不特許多大都市出現，工商業發達，而且足以說明這個發達內容的貨幣流通，亦和北方前期之陷入於停滯狀態者正相反，大概一般商品除手工業品而外，連農產品亦都商品化了。所以貨幣地租次第出現（“宋書”九“后廢帝紀”；“南齊書”三“武帝紀”），至齊武帝時，皇帝聚錢竟達八億萬之多了（“南齊書”四〇；“南史”四四“竟陵王子良傳”；“南史”五“廢帝郁林王紀”）。總的說來，專就南方經濟而言，東晉南朝二百七十年間，比之前代任何時代都更發達，所以後來楊廣當權也就開鑿運河以期吸收南方財富。

大體上看，整個南方的生產力都是向前發展的，然而生產關係就只有起着阻礙的作用。促進南方經濟繁榮的，無疑的是逃難南下的勞動人民，他們所負的任務當必很大。但是跟着勞動人民一齊南下的豪門世族貴族等大地主們，就相反地只會利用民族災難的機會，奴役人民，使他們淪為自己的“佃客”、“典計”、“衣食客”等類農奴或奴婢，並且利用他們去開發和霸占田地和山澤，動輒數十百頃，乃至萬頃，或者數縣數百里（“晉書”六九、八八；“宋書”五四；“南齊書”一四；“梁書”五二；“南史”二〇、三六、……），造成土地極端高度

集中的現象，在那里建立起他們的屯邸園墅。他們的这些屯邸園墅享有种种的特权，往往可以蔭三世蔭九族（“晉書”二六“食貨志”），可以自己組織自己的“部曲”（地主武裝組織），基本上是对國家处在半独立性和半割据性状态中的封建經濟。但就整个南朝封建經濟而言，除此半独立性和半割据性的經濟以外，还有兩種。一即編戶之民的經濟，二即自由小農的經濟。所謂編戶之民，实即國家戶籍册上的人民，即一般的農民和手工業者，直接為國家或官吏所管轄支配的被剝削压迫者。他們的經濟当即國家对内对外一切活動依以解决的唯一基礎。但是，这些編戶之民，平日在屯邸園墅半独立性和半割据性的封建剝削經濟压迫下，固然要淪為農奴和奴婢，一旦國家多事之秋，又立即是國家額外租稅和徭役的合法負擔者，因而他們又必然更迅速地陷入貧困、破產、無法生活的苦境，除仍一面淪為農奴奴婢外，而另一面就不得不像歐洲五世紀下半期許多“羅馬人”逃到野蛮人所占領的地方去一样（“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的起源”一六四頁）而出之于逃亡。“巢南”（“梁書”二）即向南徙，徙到國家权力薄弱、統治階級一時管轄不到、可以免稅、可以避役的山地去[●]，那正是所謂“山高皇帝远”、“桃花源記”所描述的世界，即蕭衍眼中“民之多幸國之不

● 宋時人民，逃亡入山，避免賦役，大概向北則逃到今日的大別山山脉中去（“宋書”九七“豫州蠻傳”），往南則逃往今日的南嶽山脉中去（“宋書”九二“徐豁傳”）。后者，当即后来梁時所謂“巢南”的一例。齐時人民往南逃亡的必定更多，其中即有逃亡于今日溫州屬懷山谷中者（“梁書”五三“范述曾傳”；“南史”七〇同）。宋、齐、梁、陈等史書，似此的例子諒必还不少。梁時人民大概往北逃亡者已少，往南逃亡者独多，所以就有“巢南”之称。

幸”(“梁書”二)的世界。这样，巢南对于当时的人民来说，在一定时期内实即一种解放，一种自由，所以虽屡经统治阶级宣传：北返则“蠲课”“蠲役”，否则必须“著上为民，准舊課輸”等等，劝诱威胁无所不至（“梁書”二），而仍无所动摇，不肯北返；迫得统治者方面如蕭方智也不得不來一次“勒归故土”（“梁書”六），而最后陈倩便要宣告“隨其適安”了（“陈書”三）。这种自由小農的經濟，不难理解，在新天新地里一定时期内有了自由發展的机会，在該一定时期内相当猛进是必然的。

由此可見，南朝封建經濟是有三种成分的。一为半割据性的，二为國家直接控制的，三为國家控制不到的。顯然三者彼此間是有分割不開的联系，亦有無法調和的矛盾。南朝社会不安定，政治多变動，而思想界亦甚复雜，多斗争、多变化，其基本原因当即在此。三者之中，首先值得指出的，是第三种，即为國家或者官吏控制不到的自由小農經濟。他們在新天新地里自由地開辟、自由地發展着。这种經濟，虽直接对于統治階級没有什么帮助，可是間接对整个南方人民的生活，从全盤着眼，帮助就一定不小。由于它是一种新生的積極的力量，为北朝所沒有，所以南朝社会尽管多变乱，多摧殘，而經濟力量却始終比北朝优越，不会枯竭，主要原因，說即在此，当無不可。其次，第二种經濟成分，是日就萎縮日就崩潰的部分，顯然，南朝農民革命之所以会不断地發生，其直接的主要原因即在于此。不待說，第一种經濟成分，对这亦不能無重要的關係。第一种成分是乘民族灾难而

畸形發展起來的東西，而且是不獨和人民、甚至和國家都還對立的東西（“全陳文”五何之元“梁典總論”），所以它在當時最突出的表現就成為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尖銳化，殘殺多，篡奪多。至若門第制度，這一決定每一個人在社會關係上、政治關係上、婚姻關係上所有地位的制度，更不待說，和這一種半獨立性和半割據性的經濟基礎也是有着不可分割的關係的。

第一種經濟成分的存在，是從豪門世族貴族等大地主階層利用國家政權以擴大其土地、保障其特權而來的存在；惟其如此，他們就更可以發揮其剝削階級的特性，不肯負擔為維護國家所必須的賦稅，而一一都向農民身上推卸、轉嫁。早在東晉中葉（335—377），他們就不肯奉行每畝稅米三升的“度田收租制”，而代之以片面有利于地主階級而不利於農民階級的“口稅制”。不唯如此，這種口稅，很快由三斛增加至五石（“晉書”二六“食貨志”）。後來又有所謂祿米每人二石的強征，甚至連已宣告廢除的“田稅”（度田收租制）又復照舊抽收了起來（“宋書”九二“徐豁傳”）。此外如布、絹、絲綿等“戶調”也改為“口調”，又是片面有利于地主而不利於農民的措施。市肆、關津、浮橋固然有稅，甚至桑長一尺，田增一畝，屋上加瓦，亦都有稅。正所謂“橫調征求，皆出百姓”（“南史”五）。換言之，一切負擔都集中到平常的農民手工業者身上，使得他們都長期處在飢寒交迫之中，而成為拖欠賦稅的“逋負”。而逋負又為貪官污吏所借口，“誅求萬端”，“枉逼”“縱劫”，無所不至（“梁書”三）。然而人民的痛

苦并不止此。平日官吏出入有役使，一旦战事發生，就更急如星火，人民等同牛馬，“徭役無度”（“梁書”良吏傳序），一歲“殆無三日休”了（“晉書”七五“范寧傳”）。而且“三中取二”（“南史”五“廢帝東昏侯紀”），“五中取三”（“南史”七〇“郭祖深傳”），“召及稚幼”（“宋書”五“文帝紀”），女子亦不能免（“梁書”二二“安成王傳”；“梁書”二“天監十七年詔”；“陳書”三“天嘉元年詔”）。更加在役期間，待遇很坏，死了沒有埋（“宋書”八二“周朗傳”），倘或生還故鄉，往往还要被勒索“米五十斛”（“文獻通考”“戶口考”）。最不幸者，病死了，战死了，反被誣作“叛亡”，來對原籍訛詐，使得死者全家和同村動遭摧毀（“南史”七〇“郭祖深傳”；“宋書”三“武帝紀下”）。这样慘無人道的徭役，人民当然視為畏途，若非甘心于“鑠械”鋤鋤，走上征途（“魏書”九八“烏夷蕭衍傳”；“梁書”五“承聖元年詔”），便要“殘形剪髮”，“斬絕手足”，“生兒不復舉養，鰥寡不敢妻娶”（“晉書”七五“范寧傳”；“宋書”八二“周朗傳”；“南齊書”四〇“蕭子良傳”），以圖消極抵抗。再不然，就只得背井離鄉，到統治階級支配不到的地方去尋找化外的生活；或者挺而走險，拿起武器，要起義，要暴動，要革命，向地主階級統治階級實行反抗了。

起義、革命，規模最大的，就莫过于東晉末年的孫恩、盧循、徐道復為首的農民戰爭。會稽永嘉等八郡農民“眾數十萬”同時憤起；還有首都建康附近各縣亦“蜂起”響應。女子亦參加作戰，竟有不惜把自己的孩子溺死，以表決心！許多豪強大地主、貪官污吏以及反動軍事首領，都被革命的怒

火所“滅門”。特別在土地集中最厲害的“三吳”（今天的江浙一帶）就打得最久；向北則打到今天的連云港附近；向南則占領住廣州、始興，并且逾嶺北進，西向打到了江陵附近，東向打到了建康城外。他們虽最后失敗，被消滅在交州，然而战斗十有一二年，馳驅數千里（“晉書”一〇〇；“宋書”一），真不愧為廣大人民群眾性的偉大的革命。

革命並沒有成功。王導附廓八十頃的賜田，直到梁初還保留着（“梁書”七）。宋、齊、梁間，范縝所处的年代，每每定有條例，嚴禁霸占田或山澤，都無效果。封建半割据性的經濟基礎不獨沒有動搖，而且還要發展；農民和地主階級間的階級矛盾沒有和緩。所以梁時羅研肯定人民“貪亂樂禍”的原因說，“百家為村，不過數家有食。窮迫之人什八九，束縛之使旬二三”（“南史”五五）。革命的火把，不可能不亮。即以范縝所处的宋、齊、梁三代言之，上自益州（四川），下至三吳（江浙），大体上以長江兩岸地主階級土地集中所在地為中心，就有趙廣（“通鑑”一二二；“宋書”五）、“赭賊”（“宋書”五）、胡世誕（“宋書”五）、高閏（“宋書”六）、史逸宗（“宋書”八）、宋逸（“宋書”八）、唐寓之（“南齊書”三；“通鑑”一三六）、周盤龍（“通鑑”一三八）、焦僧護（“梁書”二三；“通鑑”一四六）、吳承伯（“通鑑”一四七）、徐道角（“通鑑”一四七）、鮮于琛（“通鑑”一五七）、劉敬躬（“梁書”三；“通鑑”一五八）等為首的人民起義，差不多平均不上十年即有一次，前仆后繼地進行着激烈的階級斗争。虽说革命的規模日見縮小，革命的終局也沒有成功，然而人民革命的要求

却依然是非常迫切的。只因革命沒有成功，無形中整个社会就替佛教安排好了可以講因緣、講善惡、講过去、講來生、講地獄、講天堂等等迷信的市場。有此条件，有此市場，佛教發達也就成为必然了。

但是，佛教發展的市場，即在統治階級內部亦是有其根源的。因为統治階級不特对農民革命進行非常殘酷的屠殺，而且在他們自身內部，在半割据性經濟基礎上面所孕育的矛盾、斗争亦够深刻而尖銳，自相殘殺的悲丑剧不断地在演出。王敦、桓温、桓玄、謝晦、謝灵运等豪門世族大地主一連串搶奪政权的悲丑剧，姑置勿論，且看宋、齐兩代最高統治者方面所表演的就足够了。例如王僧達，被宋孝武帝刘駿所誣死，王景文被宋明帝刘彧所毒殺，都因为他們是豪門（“宋書”七五、八五；“南史”二一、二三）。又例如刘悛，僅僅是一个太守，只因刘彧夢見他要造反，便把他殺死（“南史”三）。諸如此類的例子，差不多举不勝举。而且皇兄、皇弟、皇叔、皇姪，也要互相殘殺，直殺到親人所存無几，便到街头上去，搜尋男女老少人民及犬馬牛驢來殺。刘宋如此，蕭齐亦如此。宋順帝刘准被蕭道成逼迫讓位時說：“願后身世世勿复生天王家！”●此時親眼看过前朝司馬氏复沒而今又輪到了刘氏这同一命运的老臣王琨也痛哭着說：“大家都願意命長，我今命長就覺得悲伤；老而不死，那堪一次再次看見这种情况！”當場百官人人都跟着洒泪（“南史”二三；“通鑑”一三五）。如此这般当然就是佛教得在統治階級生根的因緣了。

佛教又是表面上善于講平等、無差別的，难道佛教可为

統治者服務，亦可为被統治者服務？可为剝削者服務，亦可为被剝削者服務？果真能超越乎一切階級之上而無所偏袒嗎？南朝有一个門第制度，亦即南朝階級矛盾集中表現所在的制度。佛教对此，态度怎样？反对？擁護？佛教因果報应的說法，对于門第制度所起的作用，是肯定性的？是否定性的？且看歷史事实究竟怎样答复。

門第制度，就整个社会看，乃有旧門、次門、勛門、役門的划分。旧門、次門、勛門，人數不多，屬地主階級；役門人數众多，屬農民。其次單就地主階級內部而言，豪門、世族、貴族等大地主階層称为甲族，中小地主階層称为后門。甲族子弟，年上二十便可登朝做官，而后門子弟則非年过三十不得試作小吏（“梁書”一）。諸如此類，門第制度的存在，顯然就是整个南朝封建社会階級矛盾集中表現的所在，不特反映出地主階級与農民之間的矛盾，而且反映出地主階級內部大地主階層与中小地主階層之間的矛盾。这个制度，無疑的是只片面有利于大地主階層的制度，实为大地主階層所用以压抑人數众多的農民階級，亦用以压制人數不少的中小地主階層，使他們在企圖过問政权的路上遭受極大的阻碍。这顯然就是一种階級斗争的工具，亦即是一种加重階級矛盾的障壁，为大地主階層所必守護、中小地主階層所必摧毀的堡壘。对这堡壘，或守，或攻，所使用的武器，思想战线上很鮮明，前者用的就是佛教信仰，而后者用的就是反

● 宋孝武帝第八子被廢帝賜死時亦說：“願后身不復生王家。”（“南史”一四）

对佛教的理論。为什么守的方面亦即大地主方面要用佛教？事情很簡單，佛教有因果報应的說法，說一个人在今生或富、或貴、或貧、或賤，都为前生行为善惡所决定，今生只得接受，不必拒絕，还是安分守己的好。佛教要教導人，特別要教導貧賤的人，要有受苦受难的忍耐精神，不要鳴不平，不要对富貴中人抱“非分”的反抗的想法。無疑的，佛教这种思想，这种教導，和門第制度的精神是一致的；不折不扣实为辯護門第制度的最强有力的精神支柱。佛教所以特別为統治階級喜爱的道理，此亦一端。

但是，佛教还有許多足以麻醉人民的教理和儀式，歸根到底無一而不为統治階級的階級利益服务。這一點早就为統治階級中人所看出，認為佛教是有大作用的。沙門“焚香祝願，必先國家”，“奉上崇順，实出自然”，“五戒之禁，实助王化”（“弘明”一二）。实則連物質的建設，如“寺塔形象”，亦都“進可以系心，退可以招劝”（“廣弘”六；“宋書”九七）。助王化，系人心，这种体会，正反映出佛教跟統治階級的階級利益完全一致。其实当日最高統治者的体会更为深刻，如刘义隆說：“若使率土之濱皆純此化（佛化），則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弘明”一一；“廣弘”一）梁昭明太子蕭統亦謂佛教为“牧民之本”，可以用以“化俗”（“廣弘”一九）。后来到了隋代，王劭更總結出“柔化人心”四个字來（“廣弘”二）。王劭的柔化，实即刘义隆的此化（佛化），蕭統的化俗。顯然佛教这一宗教竟和一般的宗教沒有兩样；講起階級利益，是屬於統治階級而不屬於人民群众，因为人民群众正是佛教

所要進行“柔化”的對象。人民群眾要和統治階級對立，人民群眾反抗統治階級的特性，也算為這一批體驗者體驗到了；從而他們也就一致擁護和宣揚佛教了。後來，唐代統治階級代言人道宣更為露骨，竟謂“佛教化行”是“弘略”，因為可以“清神滅惑”（“廣弘”七）。為誰滅惑，滅誰的惑？不消說，為統治階級消滅人民群眾反抗統治階級的“惑”（實即覺悟）。統治階級對佛教能有如此進一步的了解，雖說要到隋唐以後，其實則此中要諦元嘉十二年劉義隆君臣談話中即已完全有所體會，“柔化人心”一類宗教策略已經編入於他們用以統治并欺騙人民的思想武庫里頭了。

由於階級鬥爭的激烈，拿起這種佛記思想武庫里頭的武器來進行其麻醉人民群眾勾當的人，當然都是對統治階級誓信誓忠的奴才，穿著袈裟、坐着蒲團、專門吃釋迦飯者，如竺僧敷、慧遠、玄光等可不計，一般知識分子之中，如羅含、鄭鮮之、劉少府、宗炳、顏延之、何尚之、沈約、劉勰、殷植之、明山賓、陸璣等等，都緊跟着沙門搖旗吶喊，擁護佛法，為統治階級的階級利益辯護，為幫助統治階級進行其剝削壓迫廣大人民群眾的勾當而努力。他們的使命，是反動的使命、反人民的使命。他們當中，如劉勰，如玄光，直對漢末以來農民革命領袖，指名謾罵，砌辭誹謗，無所不至，就是最突出的例（“弘明”八）。

同時，相反的亦有不少進步的知識分子，挺身而出，反對佛教，如孫盛、彭丞、何承天、范曄、蕭摹之、周朗、虞愿、范縝、荀濟等等，他們有的從批判佛教有害於社會風俗

習慣、政治經濟等現實問題出發，有的從批判佛教輪迴轉生、因果報應、靈魂不滅等等唯心論理論問題入手。他們所擒住的問題，所採取的鬥爭途徑，種種不一；然而十分清楚，十分鮮明，他們每一個人都是和那些反動的宗教迷信者集團站在相反的、對立的、不可調和的立場。他們的鬥爭是激烈的，因此往往為統治階級所鉗制；然而他們這一種鬥爭是有利於人民群眾的事業的。

南朝經濟成分複雜矛盾，有如前述，因而反映在思想戰線上情況亦甚複雜：“道士與道人（沙門）戰儒墨，道人与道士辨是非”（“南齊書”五四“顧歡傳”；“弘明”六“門論”），儒、釋、道三教互相攻訐，顯然是必然的。然而當日現實社會上還有集階級矛盾之大全的門第制度存在，這就不獨壓迫着農民，而且还壓迫到中小地主，因而就使得中小地主階層和農民接近了起來。這是一個相當微妙的關係。這個關係，反映在思想界，便在同一地主階級內部也有進步與反動的分化，即如關於佛教的論爭，思想上兩條戰線也就划分了起來。所有反對佛教迷信以及沙門惰游坐食等等者，都是屬於進步的隊伍，同時往往也就是唯物論的隊伍。相反的，把迷信當作真理，而對於惰游坐食等現象又不重視者，不待說，都是屬於反動的、亦即唯心論的隊伍。這樣，反佛抑或護佛，就是進步抑或反動。從唯物論抑或唯心論兩條戰線的划分，直接就可以看到地主階級內部矛盾的反映，而間接則為農民革命和統治階級鎮壓革命兩者間鬥爭的反映。范縝呢，更不待說，就是站在前一條唯物論者戰線上戰鬥力最強的代表者。